

近代西北地区租佃问题初探

——基于卜凯原始农户数据的分析

于敏捷 胡 浩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基于首次整理成功的卜凯第二次农村社会调查原始农户数据资料,本文在印证近代西北地区租佃经济整体落后的基础上,从佃农租佃原因入手分类探讨佃农租佃问题。研究表明,纯佃农与小型半自耕农租佃源自人地矛盾,是“维系生存型”租佃,租佃面积有限,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并强烈依赖农外就业维持生存;大型半自耕农因某些作物种植对土质的特定要求而租佃,是“改善生活型”租佃,需不同程度依赖雇佣劳动力,对农外就业依赖程度较轻。从租佃制度来说,西北地区分租制整体占优,但各地普及程度与佃农数量成正比,受生产责任、谈判能力、抗风险与地租敏感度以及生存压力与作物品种影响,两类佃农的租佃制度与地租负担存在差异。

【关键词】租佃;地租;西北地区;卜凯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1-0085-09

Tenancy Issues in Northwest China in Modern Time

——Based on Buck's Original Household Data

YU Min-jie HU Hao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Based on Buck's second original household data which has been sorte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aper confirmed the poorly developed tenancy economies in Northwest China in modern time, and focused on the tenancy issues from the aspect of the causes of land renting.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tenancy for pure tenants and small semi-owner peasants, which was a tenancy for survive, resulted from the sharp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nd and population, therefore, the tenancy area was limited and the household mainly relied on family labor and off-farm employment played an very important role for their survival. In contrast, because of special requirements of some certain crops, large semi-owner peasants rented-in land to "improve living conditions", who relied on hired labor in different extent and the effe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was small. As for tenancy system, share tenancy whose popularity was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s of tenant peasants, pre-dominated in Northwest China, meanwhile, due to different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negotiation ability, anti-risk capabilities and rent rate sensitivity, survival pressure and crop varieties as well, the tenancy system and land rent were different in these two kinds of tenant peasants.

Key word: tenancy; land rent; Northwest China; Buck

【收稿日期】2015-10-27

【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农业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卜凯调研数据电子化和数据库建设”(SKZD2012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于敏捷(1982-),女,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发展、农业经济史研究;胡浩(1964-),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

租佃关系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封建传统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关系,故学界对租佃制研究由来已久。鉴于中国历来存在的地区异质性致使各地情况互有差异,有必要“认真挖掘资料,还原历史真相”,“尤其是要加强不同地区的研究,由此不仅可以发现地方特性,也可以为总体结论奠定基础”^①。其中,对自然区划上隶属西北地区的租佃问题研究因调查统计资料缺失或文字记载偏少等客观原因而鲜见于文献。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史料,探讨西北地区土地租佃的相关特征。本文利用首次整理成功的卜凯第二次农村社会调查原始农户数据资料^②,试图从佃农租佃行为与租佃制度角度探讨西北地区租佃经济发展的若干特征,验证或补充有关近代中国租佃问题的相关研究论断,这不仅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探索,更是把握中国传统经济核心的重要课题。

现代地理分区中所指的西北地区包括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两种划分方式,前者涵盖三省两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后者则指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以北的广大区域。从与农业生产密不可分的气候条件、土壤特征以及由此引致的作物品种与耕种方式来看,自然区划下的区域内部同质性可能更为明显。事实上,卜凯对中国农业的区域划分方式^③同样遵循客观自然环境差异,除调研未覆盖的新疆地区外,其定义的“春麦区”与自然区划下的西北地区基本吻合。因此,本文将依然秉承卜凯的区域研究思路,以自然区划方式界定研究区域,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后,获取了西北地区包括甘肃4地(皋兰(一)、皋兰(二)^④、武威和天水),宁夏1地(宁夏)和青海1地(湟源)在内的总计610个农户样本,涉及农户土地租佃,土地用途,种植结构,租佃体系甚至农外就业,劳动力雇佣等诸多详尽数据资料。不可否认,这些样本县与样本农户未必能完全反映近代西北地区租佃关系的全貌,但由于该调查数据是目前唯一可得的农户微观资料,其调查数据也有一定可信度^⑤,因此,对6地610个农户的分析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对其佃农的租佃情况与地租形态有所了解。

一、西北地区租佃情况概述

佃农是指存在土地租入行为的那部分农户,包括纯佃农和半自耕农两大类,前者土地完全依靠租佃,后者则拥有部分“自有土地”。然而,上述“自有土地”概念如不明确实际用途,可能会对纯佃农与半自耕农的划分以及土地租佃比例测算等造成影响。试举一例作具体说明,如皋兰(一)9号农户兼有自有地和租入地,其中自有土地(0.103亩)全部用于建造农舍和坟墓,农业生产则完全依赖租入土地(1.545亩)。如仅考虑自有地与总面积的比例,则各类统计、调查研究中对该类农户的身份界定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认为,单纯从农业生产来说,将其界定为纯佃农更为准确,故本文所指纯佃农即为农业生产经营土地(耕地)完全租入的那部分农户^⑥。

① 李金铮:《矫枉不可过正: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的复杂本相》,《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② 时任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卜凯(John Lossing Buck)教授于1921-1925年和1929-1934年组织完成了两次大规模农村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本巨著。历时多年,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将珍藏于此的1929-1934年的第二次调查原始数据资料全方位整理、复原,获取了有关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等多方面详细数据资料,涵盖全国22个省,168个地区,16786个农户。

③ 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中将中国农业划分为小麦地带和水稻地带,其中前者包括春麦区、冬麦小米区、冬麦高粱区,后者则包括扬子水稻小麦区、水稻茶区、四川水稻区、水稻两获区和西南水稻区。

④ 卜凯第二次农村社会调查在皋兰县选取了两组调查样本,分别标示为皋兰(一)和皋兰(二)。

⑤ 如笔者以卜凯调研数据为基础,计算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南方地区人均可耕地面积为2.28亩,北方则为3.34亩,这与根据章有义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的估算值“南方人均可耕地面积约为2.34亩,北方为3.56亩”基本一致。

⑥ 下文所指土地即为不区分用途的所有土地,耕地则专门特指用于农业生产的那部分土地。

表 1		西北地区农户类型比例		单位: %
省县别		各类农户占比		
		自耕农	半自耕农	纯佃农
甘肃	皋兰(一)	86.00	11.00	3.00
	皋兰(二)	67.00	18.00	15.00
	武威	96.00	4.00	0.00
	天水	62.00	21.00	17.00
宁夏	宁夏	98.00	2.00	0.00
青海	湟源	67.27	22.73	10.0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卜凯第二次农村社会调查原始数据整理而得。

如表 1 所示,20 世纪 30 年代,西北地区 3 省 6 地中自耕农均占据数量优势,武威、宁夏两地甚至完全没有纯佃农。可见,虽然卜凯原始数据资料中样本县数量有限,却依然印证了学界对现有西北地区土地问题的既有判断,即西北地区地主较少,地权集中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租佃经济整体落后。

然而,佃农成份相当复杂,学界对近代中国其它地区的研究发现,佃农中既有类似于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富农,也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农,那种将佃农等价于小农的传统观念并不准确。那么,西北地区数量并不占优的佃农情况又如何? 地区均值可能会掩盖其中个体差异,故下文将基于卜凯原始农户数据资料,从微观视角深入研究各类佃农租佃行为,以期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

二、西北地区佃农租佃原因及其生产行为

学界往往将农户土地租佃的首要原因归结于耕地面积过小引发的人地矛盾^②,显然完全无地的纯佃农就是其中典型。那么西北地区的半自耕农情况又如何?

若以“人均自有耕地面积”作为人地矛盾衡量标准,笔者在梳理卜凯原始数据资料后发现,当时西北地区半自耕农恰好呈现两个极端,一类耕地资源极其紧张,人均自有耕地面积与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相距甚远;另一类则耕地资源比较丰富,人均自有耕地面积远优于地区平均水平;那些人均自有耕地面积数值在地区平均水平上下波动的农户均无一例外地扮演了自耕农角色。为方便表述,下文将两类半自耕农分别表述为“小型半自耕农”和“大型半自耕农”。如表 2 所示,虽然西北各地人均耕地面积不尽相同,除宁夏仅有小型半自耕农外,其余各县均不同程度存在两类半自耕农,小型半自耕农人地矛盾突出,而大型半自耕农却拥有丰富的耕地资源。从原始数据来看,某些农户甚至在闲置部分自有耕地的同时租入土地。

① 刘克祥:《20 世纪 30 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 世纪 30 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② Kung, Wu, Wu 在 Inequality of land tenure and revolutionary outcome: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hina's land reform of 1946-1952(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9(2012))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土地租佃行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耕地面积过小引发的人地矛盾。

表 2

西北地区半自耕农人地矛盾分析

单位:亩

省县别	人均自有耕地面积		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小型自耕农	大型半自耕农	
甘肃 皋兰(一)	0.68(81.82%)	3.56(18.18%)	1.58
	0.61(88.89%)	4.27(11.11%)	1.86
	2.29(75.00%)	8.78(25.00%)	5.52
	1.58(85.71%)	5.37(14.29%)	3.18
宁夏 宁夏	1.99(100%)	/	4.17
青海 湟源	3.56(84.00%)	12.48(16.00%)	7.79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卜凯第二次农村社会调查原始数据整理而得。

说明:括号内为各类半自耕农在所有半自耕农中所占比重。

有理由相信,近代西北地区纯佃农与小型半自耕农租佃多源自人地矛盾(占比约为90%),但大型半自耕农租佃则不尽然。因此下文将尝试突破现有佃农研究范式,从租佃原因入手定义佃农,进而研究异质化租佃面积、劳动力使用等。

(一)人地矛盾——“维系生存型”佃农

如上文所述,纯佃农人地矛盾最为突出,他们因耕地完全缺失而不得不依赖于租佃。同时,那些自有耕地资源紧张的小型半自耕农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地矛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北地区农民土地利用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坟墓侵占耕地严重影响耕地面积,尤其是耕地资源紧张的那部分农户并未因此减少坟墓数量或占地面积,依然将坟墓修建于有限的耕地中,个别农户甚至将2/3自有土地用于建造坟墓,使得原本有限的耕地资源更为紧张。

纯佃农与小型半自耕农共同构成了当时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群体,生存状况堪忧,不得不以土地租佃方式突破自有耕地资源限制。两者土地所有权表现形式虽有差异,但均属“维系生存型”佃农。

然而这类佃农虽因自身土地资源匮乏而租佃,却并未能通过土地租佃获取足量土地。如表3所示,各地纯佃农户均耕地面积处于明显劣势,小型半自耕农虽情况稍好,但户均耕地总面积依然未能达到地区平均水平。既有研究表明,无论租佃制发达与否,富农租佃土地要比一般农民更加容易^①,若以自有土地表征其财富水平,土地资源匮乏的纯佃农和小型半自耕农自然难以获取充足土地。

表 3

西北地区“维系生存型”佃农户均耕地面积

单位:亩

省县别	小型半自耕农			纯佃农	地区平均
	自有面积	租佃面积	耕地总面积		
甘肃 皋兰(一)	4.54	3.42	7.96	3.08	11.21
	4.64	3.27	7.91	4.38	12.39
	21.67	6.85	28.52	/	36.64
	8.20	5.21	13.41	11.52	15.87
宁夏 宁夏	10.74	6.28	17.02	/	22.31
青海 湟源	20.25	22.11	42.36	39.37	68.7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卜凯第二次农村社会调查原始数据整理而得。

^①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的土地经营与地租负担——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维系生存型”佃农耕地面积狭小,因此农业生产几乎可以完全依赖家庭劳动力^①,他们大多将租入土地用以种植小麦、黍子、糜子、高粱和黄豆等粮食作物,供给家庭食用。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佃农有限的土地资源致使其还需强烈依赖农外就业维系生存,如表 4 所示,农外就业劳动力在家庭人口中占据一定比重,农外收入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尤其对纯佃农而言,农外就业收入甚至占据家庭总收入一半以上。单就卜凯原始数据来看,当时西北地区农外就业内容比较丰富,除为人熟知的长、短工外,还包括铁、石匠,小贩、纺线、佣人等多种类别。

表 4 西北地区“维系生存型”佃农农外就业劳动力分配与收入情况

省县别	小型半自耕农		纯佃农	
	农外就业劳动力 占家庭人口比重(%)	农外就业收入 占总收入比重(%)	农外就业劳动力 占家庭人口比重(%)	农外就业收入 占总收入比重(%)
甘肃 皋兰(一)	14.28	46.52	37.23	66.50
皋兰(二)	5.68	22.17	19.28	59.62
武威	37.74	22.59	/	
天水	19.55	52.26	22.92	52.44
宁夏 宁夏	12.25	11.78	/	
青海 湟源	8.26	19.25	15.17	45.0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卜凯第二次农村社会调查原始数据整理而得。

说明:卜凯将劳动力按照男子=1 个等成人劳动力,女子=0.8 个等成人劳动力,儿童=0.5 个等成人劳动力这一标准,将所有劳动力统一折算成等成人劳动力,以剔除性别、年龄因素对劳动力实际质量的影响。这里的劳动力数据已经过上述转换处理。

(二)种植结构——“改善生活型”佃农

除大量“维系生存型”佃农外,当时西北地区同样存在约 10%自有耕地资源丰富,甚至拥有闲置土地的大型半自耕农。这类佃农的租佃原因显然与人地矛盾无关,笔者通过梳理卜凯原始数据资料,认为这一类半自耕农的租佃原因可以归结为种植结构需求,即某些作物种植过程中对土质的特定要求。具体而言,皋兰(一)、武威、天水 and 湟源地区的大型半自耕农自有耕地因灌溉条件较差仅能种植黍子、糜子等粗粮,无法种植或足量种植小麦等口感更佳、营养价值更高的细粮,加之当地农业商品化率有限,故农户专门租入山间与低谷灌溉地种植小麦等以作家庭食用,改善饮食结构,提高生活质量。皋兰(二)地区情况则比较特殊,该地在占比高达 43.6%的军屯田地^②上建有大量兵站,故对烟和鸦片需求较高,使得部分农户闲置自有土地,反而专门租入适宜土地,种植烟和鸦片以供出售,获取货币收入。

这些大型半自耕农自有耕地面积可以维持甚至超出家庭日常生存所需,其租佃行为或为改善家庭饮食结构,或为获取更多货币收入,但两者均源自对某类特殊作物的种植需求,是一种“改善生活型”租佃。

得益于丰富的自有耕地资源,“改善生活型”佃农在土地租佃市场上占据先天优势,租佃面积较大(表 5),与前述“维系生存型”佃农相比,不难发现近代西北地区租佃市场存在“马太效应”,佃农的租佃面积随自有耕地面积增加呈现递增趋势。

① 根据卜凯原始农户数据资料计算,西北地区各地小型半自耕农与纯佃农家庭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占比接近 100%。
② 近代中国土地多为私有田地,仅在个别地区存在一定数量的官有田地、学田、寺庙田地、族田、军屯田地和义田等。

表 5 西北地区“改善生活型”佃农户均耕地面积 单位:亩

省县别	大型半自耕农		耕地总面积
	自有面积	租佃面积	
甘肃 皋兰(一)	17.95	11.11	29.06
皋兰(二)	43.65	9.16	52.81
武威	37.20	9.43	46.63
天水	20.98	36.71	57.69
宁夏 宁夏		/	
青海 湟源	87.02	38.38	125.4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卜凯第二次农村社会调查原始数据整理而得。

大型半自耕农由于耕地面积较大,需要在不同程度上依赖雇佣劳动力,超过 20%的农业工作由雇佣劳动力完成。同时,该类佃农对农外就业依赖程度相对较轻。表 6 数据显示,除天水地区外,其余各地“改善生活型”佃农农外就业较少,收入贡献也比较低,在武威与湟源地区甚至完全不存在农外就业。从卜凯原始数据来看,天水地区相对较高的农外就业数据可能与当地农村经济特色有关,当地除男性从事贩卖柴碳、短工和其它手工艺工作外,几乎所有妇女、儿童均长期从事织布与纺线工作。

表 6 西北地区“改善生活型”佃农农外就业劳动力分配与收入情况

省县别	大型半自耕农	
	农外就业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重(%)	农外就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甘肃 皋兰(一)	1.12	3.33
皋兰(二)	4.04	12.00
武威	0	0
天水	13.52	40.20
宁夏 宁夏		/
青海 湟源	0	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卜凯第二次农村社会调查原始数据整理而得。

说 明:劳动力数据已转换为等成人劳动力。

综上所述,笔者在肯定佃农情况复杂这一既有研究结论基础上,尝试从租佃原因入手,分析各类佃农生产行为。研究表明,纯佃农与小型半自耕农租佃源自人地矛盾,是一种“维系生存型”租佃,其租佃面积有限,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开展农业生产,同时还需强烈依赖农外就业维持生存;大型半自耕农则因某些作物种植过程中对土质的特定要求而租佃,是一种“改善生活型”租佃,他们在土地租佃市场上具备先天优势,不同程度依赖雇佣劳动力开展农业生产,且对农外就业的依赖程度相对较轻。

三、西北地区佃农租佃制度

与近代华北地区租佃制度类似^①,当时西北地区地租包括分租制、谷租制和钱租制^②。分租制——

① 详见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一》,《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② 这些均是卜凯教授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中地租形态的命名方式,分别即为实物分成制、实物定额制、货币地租制。卜凯在书中还提及另一种在西北地区并不存在的地租形态——工佃分租制,即为雇工租佃制。由于本文是基于卜凯原始农户数据资料的研究,故在此沿用卜凯的命名方式。

收获物由主佃双方按一定比重分配,租率可以通过分成比例直接表现;谷租制与钱租制则在租佃之初规定纳租谷物或货币数量。就卜凯原始材料而言,当时西北地区地主对佃农的农业经营干涉极少,仅有皋兰(二)99号农户存在生产限制,列出“若你的不好,此地退还”这样的条款。

租佃制度纷繁复杂,笔者整理卜凯原始数据后发现,不仅地区间租佃制度各异,不同类型佃农的租佃制度与地租负担同样存在差别。表7列出西北地区租佃制度相关特点,除武威地区以谷租制为主,其余地区基本盛行分租制,其中皋兰(二)和天水地区普及率最高。研究表明,在缺乏保险体系的土地租佃市场中,若佃农数量较多且农业生产风险较大,则共担风险的分租制是风险厌恶型地主和佃农的最优选择^①。西北地区主佃双方的风险偏好虽不得而知,但分租制确实成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西北地区最普遍的一种地租形态,但各地普及程度不一,基本与当地佃农数量成正比。其中,佃农数量最多、租佃经济最发达的皋兰(二)和天水几乎完全盛行分租制,佃农数量最少的武威地区则以谷租制为主,其余地区各类租佃制度兼而有之。

表7 西北地区租佃制度特点

省县别	租佃制度	不同类型佃农租佃制度			
		“维系生存型”佃农		“改善生活型”佃农	
		租佃制度	地租负担	租佃制度	地租负担
甘肃 皋兰(一)	分租、谷租、钱租并存	分租钱租	不详	谷租	不详
皋兰(二)	分租为主,个别钱租	分租	50%	分租钱租	40%
武威	谷租为主,个别钱租	谷租	30%	谷租钱租	15%
天水	分租为主,个别钱租	分租钱租	50%	分租	25%
宁夏 宁夏	分租、钱租并存	分租钱租	60%	/	
青海 湟源	分租、谷租并存	分租	50%	谷租	65%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卜凯第二次农村社会调查原始数据整理而得。

说明:卜凯原始数据未有记录钱租数据,故表中所有钱租制地租负担数据缺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维系生存型”佃农与“改善生活型”佃农的租佃制度与地租负担存在差异,下文在说明西北三类租佃制度特点的同时,探讨引致两类佃农差异化租佃制度与地租负担的可能原因。

(一)生产责任

如表7所示,租佃制比较单一的皋兰(二)、天水与武威地区,“改善生活型”佃农与“维系生存型”佃农租佃制度基本相似,但前者地租负担明显较重。笔者认为,盛行分租制的皋兰(二)、天水地区的地租率差异可能与生产责任有关。

就分租制而言,这是一种生产责任共担、生产成果共享的租佃制度,因而采用何种比例常与主佃双方各自分担的生产责任、作物种类等有一定关联^②。当时西北地区的分租制要求佃农租入土地上所有收获物均需按一定比重纳租,如农户多在春季种植小麦,收获以后夏季种植小米、糜子或黍子,佃农的两季作物均需分成纳租。当然也存在若干特例,如个别佃农提高鸦片交租比率甚至全部纳租,或者将自有耕地上种植的鸦片纳租,从而使租入土地上种植的小麦与糜子等粮食作物的地租率下降。皋兰

① J. G. Sutinen, The rational choice of share leas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effici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5, 613-621.

②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的土地经营与地租负担——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二)与天水地区,“维系生存型”租佃分租率基本维持在50%左右,“改善生活型”租佃则仅为25%—40%。这种随耕地面积增加而逐渐减少的地租率可能与“改善生活型”佃农经营状况较好,可以自行投入种子、农具等生产要素有关,故地主承担的生产责任相应递减,其分租比率自然下降。

再来看分租制与其它租佃制度并存的皋兰(一)、宁夏和湟源地区,分租制主要盛行于“维系生存型”佃农,这同样可能源于生产责任。由于这部分佃农比较贫穷,无法自行投入必要生产资料,故必须借由分租制从地主那里获取支持以开展农业生产。其中,除皋兰(一)地租率不详外,宁夏地区佃农均实行四六分成(佃户得40%,地主得60%),湟源地区则基本围绕50%上下浮动。

(二)谈判能力

在谷租制占据主导的武威地区,“改善生活型”佃农同样获得了地租优势。事实上,谷租制地租率测算非常复杂,需要明晰佃农实物纳租的品种、亩租额等。由于当时中国各地尚未完全统一度量衡标准,需要转换为统一标准后方能进行比较^①。同时,因佃农租入土地肥沃程度不一、亩产量水平不等,亩租额可能未必能完全真实反映地租负担。非常幸运的是,卜凯教授在有关作物产量的调查统计中,除记载当年亩产量水平外,还详细记录了每个样本农户的“通常产量”、“丰年产量”和“最高产量”,这三个亩产量数据分别表示“十年内最常获得的产量”、“各种情形均有利于某种作物之时获得的产量”和“情形最佳时获得的产量”^②。这个“通常产量”数据实际上就涵盖了因土质等客观原因造成的亩产水平差异,故亩租额占通常产量的比重可以较为科学地反映地租负担。

武威地区半自耕农中大多以谷租制方式纳租,且实物租均为小麦。单纯从亩租额来看,佃农间高低不一,有1斗/地方亩与1.5斗/地方亩两种(当地1斗/地方亩约合37.03斤/亩),进一步计算亩租额在通常产量中的占比情况,地租额占通常产量的16.67%到37.50%不等,其中“改善生活型”佃农的地租负担反而更轻。笔者认为这可能与该类佃农自身土地资源优势使其在与地主的地租率谈判中更为有利有关。

(三)抗风险能力与地租敏感度

在谷租制与其它租佃制度并存的皋兰(一)和湟源地区,“改善生活型”佃农大多偏好谷租制,这可能与其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有关。

皋兰(一)有关地租率信息不详。湟源地区实物租情况相当复杂,有的佃农仅以稞麦或蚕豆纳一次租,有的佃农则需以稞麦与蚕豆/黄豆/小麦纳两次租,加之作物市场价值不一,故以各种作物计算获得的亩租额各有不同,但基本表现为收一次租的地租额是收两次租的两倍左右。此外,小麦因市场价格较高,故以小麦表示的地租额(1斗/地方亩)相对较低(当地1斗/地方亩约合80.01斤/亩),其它作物的地租额基本维持在2—2.5斗/地方亩。仅从亩租额绝对数值上来看,湟源地区的佃农负担显然要比武威地区更为沉重,然而由于两地可能存在的产出水平差异,有必要进一步比较地租额与通常产量^③

① 当时中国各地度量衡标准不一,亩制与量器也极不一致。从卜凯原始数据资料来看,统计中产量、面积、距离与货币等单位的表示比较复杂,如产量单位包括斤、斗、担、石等,面积单位为地方亩,距离为未标记名称的地方单位,货币为吊、元、银元等。这些单位不仅与公制存在差异,且地区间也截然不同,换言之,各地虽同标记为“斤”,不仅不等于市斤,且斤与公制的转化率各不相同。故课题组对原始数据资料整理过程中,参考卜凯教授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中详细记载的各地“斤”与公斤的转换率、地方亩与市亩/公顷的转换率获取相关产量与面积数据。同时将原始数据中记载的各地均值与《中国土地利用》中已经折算为公制的均值进行比对计算,获取了不同作物斗、担、石与公斤的转化率、距离地方单位与米的转化率以及货币单位相应转换率。

② 详见卜凯《中国土地利用》(1937)第279—291页有关作物产量的内容。

③ 由于卜凯教授将通常产量的测算时间界定为10年,故所有种植时间不足10年的农民该数据记载为“u”,即指unknown(未知)。湟源地区个别佃农通常产量数据未知,这里用当年亩产量代替。

的比值情况。纳两次租情形下,各种作物实物租占比均在 1/3 上下浮动,纳一次租情形下,以稞麦纳租的相对较低,约占 50%,以蚕豆纳租的超过 70%。可见,湟源地区佃农的地租负担相较于武威要繁重得多。笔者认为这可能与湟源实行谷租制的佃农大多耕地资源丰富,生活压力较小,对地租敏感程度相对较低有关。

(四)生存压力与作物品种

表 7 显示某些地区“维系生存型”佃农实行钱租制,有些地区却盛行于“改善生活型”佃农。虽然钱租制租率不详,但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可能与生存压力和作物品种有关。

一般认为,钱租制与商品经济息息相关,多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或小麦的土地^①。皋兰(二)、武威地区的钱租制恰好印证了这一理论,这些以货币形式纳租的佃农均为“改善生活型”租佃,他们生存压力较小,不存在农外就业行为,通过在租入地上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小麦、烟和鸦片后大量出售获取货币收入,其中小麦出售比约为 20%,烟和鸦片则几乎全部出售。

然而,皋兰(一)、天水 and 宁夏地区截然相反。皋兰(一)和宁夏地区的钱租制仅盛行于“维系生存型”佃农,他们生存压力较大,为在落后的商品经济环境下最大限度获取温饱,不仅没有经济作物种植行为,粮食作物也多以黍子、糜子等粗粮为主^②,所有作物未作销售,全部用于家庭自食^③。天水地区的钱租制更是仅出现于纯佃农群体,他们租入土地种植高粱、玉米、黍子等粗粮以供自食,维持温饱。若在肯定卜凯未有遗漏农作物出售数据的前提下,钱租制的货币来源很可能来自农外就业。这些“维系生存型”佃农由于耕地面积有限,土地被用于粗粮种植,经济价值较低,更重要的是,在应对自食需求后再行交租的可能性较小,故佃农剩余劳动力通过农外转移在平衡人地矛盾的同时,以农外就业收入支付地租。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研究表明,近代西北地区租佃关系整体并不发达,这些数量不多的土地租佃大多源自人地矛盾;但部分耕地资源充足的大农因种植结构需求同样开展租佃经营。前者是一种“维系生存型”租佃,租佃面积有限,佃农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开展农业生产,同时强烈依赖农外就业维持生存;后者是一种“改善生活型”租佃,租佃面积较大,佃农需不同程度依赖雇佣劳动力开展农业生产,且对农外就业的依赖程度相对较轻。就租佃制度而言,西北地区分租制、谷租制与钱租制均有所分布,但分租制整体占优,其盛行程度往往与各地佃农数量成正比。此外,受生产责任、谈判能力、抗风险与地租敏感度以及生存压力与作物品种影响,“维系生存型”佃农与“改善生活型”佃农的租佃制度与地租负担各异。

当然,对于租佃问题的研究远不止于此,对于卜凯庞大、复杂原始数据资料的研究也不止于此,无论是对租佃问题抑或是卜凯原始数据的研究仍需学界继续努力。笔者认为,鉴于卜凯原始资料中大量微观农户丰富详实的数字材料,未来可以对近代中国各个地区的租佃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给出明确实证回答。此外,若能结合卜凯数据资料与同期历史资料,或许会对近代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给出更为明确的回答。

(下转第 68 页)

- ① 详见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一》,《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 ② 根据课题组对卜凯原始农户资料的整理发现,在商品经济较不发达的西北地区,小农(无论是否存在土地租佃)在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中更倾向于种植粗粮,这可能一方面源自本身土质原因,另一方面则与粗粮更高的单产与热量水平有关,更易于满足家庭温饱。
- ③ 如前所述,卜凯原始农户数据资料中“各种作物各项用途的数量”中详细记载了每一个样本农民各种作物的出售数量。笔者经过数据整理发现,皋兰(一)所有以钱租制方式纳租的佃农均不存在作物出售行为,所有土地产出均以自食方式消耗完毕。